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02

#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意蕴

尹 倩, 许跃龙

**摘要:**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国情世情, 基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将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与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这一道路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性超越,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推进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展现出历史必然性、文化传承性、理论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破解全球“四大赤字”、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个结合”; 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 逻辑理路; 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2-0011-11

**收稿日期:** 2025-11-18

**基金项目:** 2025年天津市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计划项目“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堂’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TJYG25018)。

**作者简介:** 尹倩(1973—), 女, 山西大同人,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E-mail: yinqian8290@sina.com; 许跃龙(2001—), 男, 山东聊城人,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但全球“四大赤字”交织叠加,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 “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亟待破解。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 纷纷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1][11-12]</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 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深刻阐明“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两个结合”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实践形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sup>[2]</sup>，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亦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 一、理论基础：“第一个结合”引领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生成

### (一) 经典溯源：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战争根源剖析与和平路径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战争与所有制的内在关联出发，揭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批判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指明了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真正的共同体”。

第一，私有制引起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sup>[3]198</sup>。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战争”，通常是指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社会的各种战争。他们认为，不同阶级以及阶级集团之间的对立及由此引起的冲突，是战争产生的根源<sup>[4]12</sup>。列宁指出，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sup>[5]366</sup>；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sup>[6]326</sup>。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迫使资本对外扩张，引发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资源、市场的争夺，当和平协商无法满足资本利益时，战争成为最终解决手段。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他们立足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批判资本主义列强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指出这类战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海外殖民地、攫取经济利益而发动的暴力冲突。他们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超越国界与民族界限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建立永久和平的共产主义社会。1860年马克思论述英法联盟对土耳其干涉问题时表达了对人类和平的深切期许，“整个欧洲都处在期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问题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sup>[7]122</sup>。1862年马克思写文章论述墨西哥人民解放斗争，严厉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sup>[7]381-393</sup>。

第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永久和平。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sup>[8]523</sup>，而阶级只能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因此，马克思指出，要想实现永久和平，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这个造成战争的根源，建立同旧社会相对立的以和平为国际原则的新社会<sup>[9]61</sup>。此“新社会”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其通过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消除冲突的根源，使和平成为社会的内在属性，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只有当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化结合，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时<sup>[10]538</sup>，才能消除民族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实现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良性关系，这种良性关系正是和平的社会根基，它使不同群体意识到共同利益远超局部利益，从而主动规避冲突。

第四，“真正的共同体”是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理想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区分了“虚假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虚假共同体”，本质上是维护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其内部的“和平”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被剥削基础上的虚假和平，外部则通过殖民扩张、霸权争夺等方式制造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战争，“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

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sup>[11]199</sup>。而“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以消灭阶级对立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11]199</sup>,消除了剥削、压迫等产生冲突的根源,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1]422</sup>,揭示了真正的和平不是无冲突的静止状态,而是消除了对抗性矛盾的社会和谐形态。

## (二) 实践演进: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中国化探索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彰显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揭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民族解放捍卫和平。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内核,将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相结合,提出“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sup>[12]224</sup>的重要论断。毛泽东提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sup>[13]680</sup>,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唯有“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sup>[14]22</sup>,才能获得真正和平。这将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情相结合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sup>[15]79</sup>,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sup>[13]668</sup>,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实现真正和平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彰显了“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以民族解放捍卫和平”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和平外交拓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对内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消除私有制战争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以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明确“中国永远不称霸”<sup>[16]40</sup>。1950年,为争取新中国建设的和平环境、抵御帝国主义威胁,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最终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国际关系准则,突破了西方主导的霸权外交逻辑,成为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遵循。此外,面对冷战格局,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形成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sup>[17]66</sup>,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通过积极推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动万隆会议达成“求同存异”的共识并通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实践,扩大了和平力量的国际影响,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和平发展凝聚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苏争霸态势缓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步显现。邓小平基于对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的深

刻洞察,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中“和平与发展相统一”的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突破“战争不可避免”的传统认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sup>[18]22</sup>,指出和平和发展问题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sup>[19]105</sup>。他强调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sup>[19]360</sup>,并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sup>[19]56</sup>。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特质,他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sup>[19]328</sup>“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和平的,强调了和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我国不能也不会走西方掠夺、侵略扩张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此外,江泽民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sup>[20]313</sup>,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sup>[21]</sup>,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时代内涵,将共同体思想从“政治联合”拓展到“利益共享、安全共护”的层面。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共同体思想升华到人类命运与文明进步的价值指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深刻阐释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愿景<sup>[15]52</sup>,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此外,还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sup>[22]13</sup>,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价值引领;倡导“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路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这一全人类和平发展理想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sup>[23]23</sup>。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和平的物质基础,以共同富裕消除贫富对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推动平等的世界交往,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的当代实践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的必然产物。

## 二、文化根脉:“第二个结合”滋养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sup>[24]18</sup>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精神共鸣探索“第二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与中华“和合”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了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生命力。

### (一) 国际秩序之向: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的内在统一

“协和万邦”作为中国人对外尚德不尚武的指导思想,最早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上古时期尧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道德理念<sup>[25]14</sup>。这一文化基因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史。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体系,

虽有等级秩序,但核心是礼尚往来而非武力控制。汉代张骞通西域,以“丝绸贸易”而非军事征服构建“陆上丝绸之路”,汉朝未对西域城邦用兵,反而设西域都护府保护商路安全。明代郑和下西洋抵达30余国,以“宣德化、赐礼物”开展交流,调解争端、传播文明,这与同时期欧洲殖民者地理大发现后的掠夺行径形成鲜明对比。

“协和万邦”国际观以“以和为贵、万国咸宁”为内核,追求“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共生秩序,反对以武力征服的“霸政”,倡导以道德感召、互利协作实现“天下太平”。这与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所倡导的“人类整体利益优先”“反对不平等交往”思想高度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促进世界交往方面“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sup>[26]35</sup>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导下世界交往的非正义性即促成世界交往不是资本的主观目的,而是寻求资本增殖的“额外产物”<sup>[27]</sup>;他们反对资本主导的“虚假共同体”,指出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交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26]36</sup>。世界交往异化为商品的关系、物的关系,导致其他文明的衰微,是不平等的交往。“协和万邦”国际观同样反对国家之间的对立,追求“天下一家”的共生秩序,二者均将人类整体利益置于民族国家狭隘利益之上,不是服务于某一阶级或某一文明的特殊利益。在交往原则上,二者均反对不平等交往,倡导平等包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导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强调交往的正义性;“协和万邦”国际观主张平等相待与和而不同,反对霸权与强加,追求“万国咸宁”的共生格局,二者共同指向文明平等的交往秩序。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本质契合,使得“第一个结合”能够自然延伸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二个结合”能够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愿景,二者共同支撑和平发展道路突破“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形成“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发展相统一”的独特优势。

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虽诞生于不同历史语境,但因共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趋势,即国际秩序必然从对抗割裂走向和平协作,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真理和文明智慧的理论支撑,成为摆脱当代全球化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也为人类探索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了中国智慧。

## (二) 社会和谐之维: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与“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的实践融通

“和而不同”源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核心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在和谐共生中实现统一,既反对“同而不和”的强制同化,亦拒绝“和而无同”的无序割裂,是中华文明处理社会关系、整合多元力量的核心智慧。“和”不是无原则妥协,而是“矛盾双方辩证统一的均衡状态”,这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在对事物差异性的认知和矛盾统一的价值目标上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sup>[28]305</sup>,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sup>[29]306</sup>,这一观点揭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强调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通过斗争与统一实现事物的发展;而西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哲学道理强调了和谐与差别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性,恰是对矛盾普遍性的承认。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将“阴阳”这一对立统一体视为万物化生的本源。这种承认差异、以和生物的认知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是事物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的思想高度契合,二者皆拒绝“无差异的同一”,认为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中的“同一性”,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属性,是事物保持稳定、实现转化的基础;“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强调通过保持和谐与平衡的状态,达到万物的正常循环与利益,恰是对矛盾同一性的古典表达。朱熹注曰:“太和是‘阴阳会和冲和之气’”,明确“太和”并非消灭对立,而是与对立面共存,通过对立双方的协调平衡实现整体和谐;这种“共存—平衡—和谐”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同一性维系事物统一体,为矛盾转化提供条件”<sup>[28][328]</sup>的观点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与“和而不同”社会观的高度契合性,本质是科学真理与文明智慧的共鸣,二者的契合不是“外力嫁接”,而是规律与智慧的内在统一,即二者皆主张在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这种辩证思维的共通性,使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中的“消灭阶级对立”与中华“和合”文化中的“消除隔阂、天下一家”的观念能够在哲学层面形成共鸣,为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既坚持原则又包容多样”的思维支撑,这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 (三) 人民和善之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的价值同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sup>[30][88]</sup>“人心和善”并非单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对个体最基本的道德素养要求。“和”是一种社会价值理念,“善”是一种道德素养要求,二者相辅相成。

“人心和善”道德观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精神标识,强调人际和睦、群己共生。从儒家“和为贵”“仁者爱人”到道家“万物共生”,再到墨家“兼爱非攻”,始终以“和”作为道德实践的核心目标,将善与和相统一,追求人心归善、社会归和的秩序。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以实践为纽带、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基于社会发展规律追求和谐秩序的科学理论。“真正人的道德”作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核心范畴,其超越阶级对立<sup>[9][47]</sup>、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与“人心和善”道德观“至善”“达德”“天下为公”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道德目标上,二者皆追求“个人德性完善”与“社会关系和谐”的辩证统一,既关注个体的道德自觉,也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形态。

在个体道德目标方面,“至善”“达德”与“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同向性。“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将“止于至善”作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中庸》以“知、仁、勇”为“天下之达德”,确立个体全面德性要求;孟子主张“尽心知性”践行人伦道德,以达“圣人”至善境界;荀子提出“礼作义分”的实践路径,强调礼是“人兽之别”的纲纪,学礼践礼可成“尽伦者”,为“人心和善”提供外在规范。这种对个体全面德性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高度契合。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中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其核心要义是消除异化、恢复人的本质力量,这与“人心和善”所倡导的“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管子》)的道德自觉,本质上都是对“人的完整性”的追求。恩格斯“真正人的道德”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反对资本对人的异化,这与“人心和善”中“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篇》)对个体内心仁善的重视,共同指向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实现。

在社会道德目标方面,“天下为公”“天下归仁”的和谐秩序与“真正人的道德”“全人类解放”具有

同质性。“人心和善”道德观的社会目标,体现为“天下归仁”的共同体理想。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最终指向《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一理想强调消除对立、共享太平,与马克思主义“全人类解放”的社会道德目标具有同质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sup>[9]471</sup>,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的这样一个道德:尽可能多生产剩余价值”<sup>[31]533-534</sup>。“真正人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sup>[9]471</sup>才成为可能,其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恩格斯提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与孔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博爱精神相通;二者均反对剥削与对立,追求无阶级对立的和谐社会。“人心和善”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特质上高度相通。二者的有机结合,既激活了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从而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

### 三、价值意蕴: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当代意义

#### (一) 文明超越:破解西方现代化迷思,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32]29</sup>。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扩张、资本输出等暴力手段实现发展,形成“中心—边缘”剥削体系。如今全球“四大赤字”加重<sup>[24]60</sup>,构成“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西方国家因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日渐陷入困境<sup>[33]59</sup>,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sup>[34]</sup>。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所作出的合乎中国之道的中国回答。

#### 1. 倡发展优先,惠南北各方:共同繁荣的中国赋能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sup>[35]368</sup>。2021年,当全球发展事业遭遇逆风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为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为重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关键动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问题<sup>[36]</sup>。该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sup>[37]</sup>;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突破100个,近40个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至2025年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sup>[37]</sup>。此外,中国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该基金已累计支持150余个聚焦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的合作项目;启动总额5000万美元的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三期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支持乌干达、斯里兰卡等国农业项目;加大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投入,立项支持20多个联合国机构在60多个国家开展减贫、绿色转型等项目<sup>[37]</sup>。这些举措汇聚了多元发展资源,为全球发展注入务实动力。

#### 2. 筑安全屏障,促携手共治:全球安全的中国方案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其一,在传统安全领域,自1992年中国派出首支成建制“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已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sup>[37]</sup>，同时推动五核国落实《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维护全球核战略稳定。其二，在热点政治问题解决上，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在巴以冲突中推动安理会通过首份停火决议、促成缅北相关方达成停火协议……中国的斡旋与调解为多个国际热点问题降温，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其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柬、老、缅等国联合执法打击跨境犯罪，抓获数千名涉诈嫌疑人；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向世卫组织捐款5 000万美元，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3亿剂新冠疫苗，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3万余名医疗队队员<sup>[38]</sup>，助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深化了多领域安全的国际合作，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sup>[39]</sup>。

### 3. 聚上合力量，献治理良方：区域共治的中国范本

2025年天津上合峰会成为和平发展的区域范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sup>[40]</sup>，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又一重要思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真正平等、互利共赢和可持续的治理合作框架”<sup>[41]</sup>。峰会通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呼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彰显上合组织作为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者的立场。中方推动成立“四个安全中心”，将上合大家庭扩容至27国，发布未来10年发展战略，落地成立开发银行与6个务实合作平台，打出“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合作”组合拳。这种“安全共筑+发展共兴”模式，呼应了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动荡世界提供稳定锚点，为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 (二) 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 1. 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新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对内两极分化实现发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初衷。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发展自身与造福世界相统一的道路，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鲜明的时代内涵。这种新内涵体现在：其一，将和平确立为发展的前提与底色，摒弃了以殖民扩张谋求现代化的西方路径，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论断即和平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其二，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的弊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理论认知。其三，将全球共赢纳入发展视野，回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诉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提出通过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 2. 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与全球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以“非侵略、非掠夺、共赢共享”的实践形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这种实践拓展体

现在:在国内,通过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实践,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转化为民生改善的具体成效,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说服力;在国际上,通过“四大全球倡议”与“一带一路”合作,将国际主义理念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实践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发展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独特国情,还展现了全球现代化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在当代世界的具体体现,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球视野。

### (三) 文化焕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典范

#### 1. 激活“和合”基因,实现和平理念的现代转化

“和为贵”“和合共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这种传统和平理念从伦理层面转化为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交往准则,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塑。在转化路径上:一是将“和而不同”转化为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和而不同”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零和博弈的“文明冲突”思维,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选择,使“和合”思想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二是将“天下大同”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天下大同”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理想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将其拓展为全球层面的共同追求,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sup>[22][52]</sup>,赋予大同理念以全球性、时代性内涵。三是将“以和为贵”转化为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以和为贵”倡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解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国际冲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让传统和平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际治理实践。

#### 2. 以文明互鉴理念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特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打破西方“现代化=西方化”的文明霸权叙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创新性发展。这种创新性发展表现为:一是在文明对话中彰显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既坚守传统文化根脉,又不故步自封,通过举办世界汉学大会、全球文明论坛等平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讲好中华文明故事”<sup>[42]</sup>,让“和而不同”“文明互鉴”等理念获得全球认同。二是在吸收借鉴中丰富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实践,而是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将西方现代化中的科技进步、治理经验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洋为中用、古今交融。三是在实践创新中重塑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转化为现代文化产品、社会风尚与价值理念,例如将传统“家国情怀”转化为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传统诚信理念转化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5-10-23)[2025-11-01].[https://www.gov.cn/yaowen/li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https://www.gov.cn/yaowen/li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李慎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6] 郑德荣,王占仁.毛泽东思想纵横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7] 孙建社.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8]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辅导教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1] 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9-16(001).
- [22]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3] 郑必坚.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5] 李红姝.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国制度中的外交思想[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
-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刘文祥,赵庆寺.全球文明倡议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的原创性贡献[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9-16.
- [2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9] 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
- [34] 习近平.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01).
- [35]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6] 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2023[R/OL].(2023-06-21)[2025-11-18].<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1673878316910813186>.
- [37] 外交部发言人: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EB/OL].(2023-05-31)[2025-11-18].[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5/content\\_6883872.htm](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5/content_6883872.htm).
- [38] 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进展报告[R/OL].(2024-07-18)[2025-11-18].<https://www.ciis.org.cn/xwdt/202407/W020240718528334066314>.

pdf.

- [39] 为民族复兴尽责 为人类进步担当——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外交成就综述[EB/OL].(2024-09-28)[2025-11-18].[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7173.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7173.htm).
- [40] 习近平.凝聚上合力量 完善全球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5-09-01)[2025-11-18].[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266/202509/content\\_7039601.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266/202509/content_7039601.html).
- [41]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合作框架(国际论坛)[N].人民日报,2025-10-04(003).
- [42] 尹倩,傅峻毅.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聚合与实践融通[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7(5):25-34.

## The Logic Construc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YIN Qian, XU Yuelong

**Abstract:**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 distinctive hallmark that distinguish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Proceeding from China's new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evolving global landscape, and in light of the high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valu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Marxist thinking on peaceful development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deeply fused it with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al genes of harmony and peacefulness. This path is therefore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such integration. This path has achieved a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shattered the myth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to Westernization", and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has not only opened up new horizon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but also promot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y and reconciliation"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demonstrat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dhering steadfastly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solving the global "four deficits," and realizing lasting world pea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logical construction; value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周兴涛